

林擎国¹ 黄 岚²

1.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福建 厦门 361005)
 (2. 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硕士研究生,

[摘要]我国加入WTO,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标志。强化经济全球化的意识与思维,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有理、有利、有节地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和企业市场竞争力,主动参与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竞争;从国情出发,坚持自力主导型的发展战略,这是我国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全球化思维 中国 竞争力 自力主导型经济

[中图分类号]F114.41;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2)01-0069-04

我国加入WTO,正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标志。如何以经济全球化的思维为指导,制订和实施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力求持续生存与主导发展,意义重大。

一、强化经济全球化的意识与思维

我们已经习惯从本地区或本国的视野和利益来认识与处理经济事务,经济系统基本上仍然属于封闭型的体系。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地方保护主义的思维与行为就是证明。地方保护主义不仅制约了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健康运作,更是严重地违背了WTO、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精神与惯例。要融入到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与市场体系,在规模扩大的全球舞台上去竞争地位和机会,没有转变观念,强化经济全球化的意识与思

维,就不能正确开展经济实践,更难有大作为,甚至会

被主宰、被淘汰的危险。

首先,只有强化经济全球化的意识与思维,才能把握发展的主动权。18世纪末首先进行产业革命的英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的日本,都赶上了经济全球化促成的全球经济发展的难得机会,发展为名列前茅的经济大国。亚洲“四小龙”也抓住了60、70年代发达国家产业调整的大好时机,实现经济腾飞,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相反地,我国近现代两次闭关锁国,错过了种种的发展机遇,造成严重的落后。现在,经济全球化促使生产要素及其生成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促成全球主要国家在世界市场里展开更加公平、

义的思维方式,取而代之以积极的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就是只顾自己的利益,而毫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得失,甚至以牺牲他国的利益来实现自己国家的利益。这种思维方式是短视的,它只有在其他国家不采取报复的情况下才能奏效,而这从长远来看是不可能的。一旦所有国家都采取这种方式,结果是大家都遭受损失,因而狭隘民族主义最终是害人又害己的。与狭隘民族主义相反,积极的民族主义就是在尽量不损害他国的情况下追求本国的利益。在国内,它通过强化基础设施、发展教育、支持科研、完善法律制度等为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在国际上,它通过与其他国家友好合

作,互惠互利,以一种对全球社会负责任的态度追求自身国家利益,谋求全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①里斯本小组著,张世鹏译《竞争的极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39-40页。

②[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1-12页。

③[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99页。

责任编辑:黄振荣

学术
研究

更加激烈的竞争。特别是,高新科技革命席卷全球,世界经济布局在调整,结构在升级,进入一个以因特网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新阶段,各种生产要素向更为有利可图的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发展机遇是客观存在的。我国加入WTO,就要树立机会意识,主动抓住机遇,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规模庞大、政治局势稳定以及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健全等优势,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奋起直追,在新世纪的发展新阶段迎头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

其次,只有强化经济全球化的意识与思维,才能在越来越大的风险性面前把握竞争的主动权。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经说过,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一直是被投机者所控制的;世界已面临着比以前更多的风险,这正是一种最新的现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投资、生产、贸易、技术出现“无国界”化的趋势,国际分工更加精深细化,竞争的激烈程度和经济活动的风险性越来越大。这要求各国的经济运行和企业经营必须具备风险意识,做好应变的心理准备和制定科学的战略与策略。任何对风险性估计不足或是措施不力,都可能造成国家经济的衰退甚至崩溃,企业经营的亏损以至破产。墨西哥、亚洲金融风险引发的经济危机就是明证。强化经济全球化的意识与思维,就是要自觉认识严峻的挑战,树立经济、金融、信息、技术乃至国家等各种新的安全观,积极防范,主动竞争,争取把加入WTO所付出的代价下降到较低限度,从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取得更大的利益和发展。

最后,只有强化经济全球化的意识与思维,才能以全球一体化的观念指导和搞好本地区和本国的经济活动。例如,树立大国际贸易观念,把货物、金融、服务、技术交易与直接投资综合起来考虑,可以取长补短,获取最佳的组合效益;把刺激国内消费和投资与增加对外贸易往来结合起来考虑,有利于两者积极互动,相辅相成;把吸引外部优势的生产要素与本地区或本国优势的生产要素密切结合起来,形成有效的生产力,促进投资环境的优化、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形成一个按照国际惯例运作的良性的市场经济循环体系。

总之,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竞争的全球化,

也是经济利益的全球化。没有危机感,就是最大的危机;没有机会意识,就不能抓住机会求发展;没有以应变意识和能力,就将沦为输家。

二、立足于提高两个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逐步造成了一种自由、公平的国际竞争机制和局面。这是一种更为激烈的竞争,因为它的范围已经从一个国家拓展到一个区域乃至全球,参与竞争的主体更加多元化,更富有挑战性。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竞争力和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高低,重要的体现是对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占有率。不参与竞争,就被淘汰,没有竞争力,就落后挨打,失去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占有率,则趋向衰亡。我国参与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竞争,提高占有率,有赖于国家经济竞争力和微观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因此,增强国家经济竞争力和企业市场竞争力是国家宏观管理和企业微观经营的主要目标。

增强国家经济竞争力,归根到底是增强科技、教育和环境的竞争力;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实质上就是生产出更多市场适销对路的高质量、低成本、无公害的名牌产品。增强国家经济竞争力与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是互相依存、互相促动的,不能截然分开,但也不能代替。前者为后者创造外部支持和优质服务。后者为前者提供内部实力和坚实基础。如何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提高产业、产品与服务的技术含量,增强整体经济实力?如何以“生产人优先”的理论为指导,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培养大批精英,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适应经济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如何营造优良的国内投资环境,特别是优化投资的软环境,吸引更多外部生产要素到国内投资,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如何在过剩经济条件下的买方市场里根据消费需求的变化,提供既能有效占领国内市场,抵抗外国产品对我国市场的蚕食,又能开拓国外市场,与外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分庭抗礼,提高国外市场占有率,最终发展成为国际化企业,完成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三部曲?这些是增强国家经济竞争力和企业市场竞争力务必解决的基本问题。

其一,科技的创新性和应用性是科技进步和科技产业化的生命力所在,有创新,才能有突破性发展,才

能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有应用，才能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推进作用，在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中获得实际的效用，提高经济效益。我国科技的落后原因主要在于：创新不足，创新的体制与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盲目引进，一味模仿，核心技术掌握在别人手里；科技研究脱离经济领域，科技成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应用于生产实践。美国经济史总结的在创新出现后很久才从新技术中受益的重大教训和日本 80 年代后期拘泥于“技术反转论”，忽视科技的创新研究造成的失误，都值得我国引以为戒。

其二，在国家经济竞争力和企业市场竞争力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劳动者素质和人才。经济全球化对各级从业人员特别是政府管理和企业经营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一大批外向型复合人才，就谈不上国家经济竞争力和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就免不了竞争失败的命运。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产业是睿智的战略决策，同时，政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促使企业建立员工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机制，提高劳动者素质，才是抓住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关键。

其三，随着国际经济和市场竞争的激烈化，投资风险性增高，国际流动资本的投资者越来越重视投资环境的选择，特别重视软环境优劣的评估。我国不但需要加强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硬环境，而且需要认真营造一个优化的软环境，既要规范政府调控经济的行为，减少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提高政府机关的办事效率，提倡为企业服务的态度和作风，打击各种严重扰乱市场经济运作的违法乱纪行为，又要重视改善金融、税务、海关和交通运输等窗口行业的工作质量，发挥它们沟通对外往来，促进国民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替代的作用。具体地说，需要从简政放权的管理环境、优惠透明的政策环境、高效优质的服务环境、严明规范的法制环境、优美舒适的人文环境等方面，创造一个优化的投资软环境。

其四，要学会从三个环节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一是从面向企业和产品转为面向市场和消费者，把市场需求信息和技术可能性结合起来，重视产品与服务的创新设计，研发市场适销对路的产品与服务；

二是简化投入产出系统，进行企业流程再造，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三是重视产品与服务效用实现，收集和分析消费者对产品与服务的消费意见，以改进下一轮再生产。在此基础上，实施名牌战略，培育一批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名牌产品。

三、坚持自力主导型的发展战略

一个国家和地区完全融入全球一体化的经济体系，按照国际分工理论行事，企图长期依靠外部世界直接投资主导模式发展是危险的。日本《世界经济评论》指出：“迄今直接投资主导型的增长不仅是正确的，而且获得了成功。然而，今后不是过分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而应该优先实现自力主导型的增长，把对外资的依赖置于从属地位。这就是东亚经济重新起航所应遵循的原则。”我国拥有近 13 亿人口，更需要坚持自力主导型发展的战略。1998 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是正确的战略抉择。

我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企业实施减人增效的改革，势必迫使大量的隐性剩余劳动力显现出来，离开现有工作岗位，形成对社会的一种重压。因而，实施再就业工程，是迫在眉睫的工作。应当承认的是，外部生产要素在我国直接投资，兴产置业，可以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但是这种就业机会一般需要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即使外部生产要素投资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或项目，也可能因装备先进的技术和机器而排挤一般劳动力。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劳动力以一般劳动力为主，知识和技能素质总体偏低，特别是已经和正要下岗的劳动力，其就业机会主要应当依靠增加国内生产要素的投资来提供。解决我国众多素质偏低的劳动力就业问题，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增长速度（统计分析表明，我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创造 500 万个就业机会），而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增长速度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消费需求变化的趋势，努力发展一些新兴产业，培育能够容纳更多劳动力就业的国民经济新生点。例如，根据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的兴起，生产消费结构的调整与升级，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社会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的加快，家务劳

动和家庭生活的社会化等趋势,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再加工业、社区服务业、家政服务业、保险业、旅游业、医疗卫生保健业、文化教育业等。

与此同时,如何拉动经济增长,依靠刺激净出口的增加,还是依靠内需的扩大?实践证明,主要依靠刺激净出口增加的拉动是不够的,而且风险比较大,主要依靠内需的扩大,才是立足之本。这是坚持自力主导型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在扩大内需中,重中之重的是增加国内消费需求,这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一是因为最终产品一旦进入生活消费领域,实现了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就确保社会再生产运动周而复始地顺利进行,另一是因为国内消费的最终产品一般占全部最终产品的 $2/3$ 左右,发挥较大的拉动作用。而有效增加国内消费需求,需要以提高全体人民的总体收入水平和合理调整全体人民收入结构为前提,这最终有待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成功开发和人口城市化水平的较快提高。也就是说,开发中西部地区与提高人口城市化水平,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实施自力主导型发展战略,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提高全体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亟待解决的两个极其重要的战略任务。

就满足我国近 13 亿人口基本生存和发展的需求而言,其基础是农业能够提供足够的消费品。我国农业生产的比较效益差,小农生产方式不能与市场经济有效接轨,将承受加入 WTO 后更多的外部挑战,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种粮不如买粮。为此,有些学者提出到国外市场购买粮食,把国内一些有限的生产要素(如资金和土地)用于发展比较效益高的产业。这种观点忽略了我国将近 13 亿众多人口的需求量与全球粮食市场供给量的失衡关系及其制约作用,是不可取的。无论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如何差,我国还是应当坚持自力发展农业,这不但是维护我国经济持续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也是确保我国社会、政治持续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当然,我们应当强调发展外向型农业,提高农业生产的外向度,与外部农业生产体系进行必要的交易。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放弃或坚持比较效益差的农业,而是如何改进我国农业的发展方向、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提高农业的产出率和比较效益,保证我国众多人口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我们可以借助“三色

革命”的思路,按照发展现代立体生态大农业的根本方向,通过组建公司农业的组织形式,实行农业产业化的生产方式,走科技兴农的道路,逐步形成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内外贸、经科教一体化的生产经营体系,引导我国农业走上高产、高质、高效的新路子,促进农村经济并入社会化、产业化和商品化的现代化轨道,解决农民增产增收的实际问题,进而带动更多的农民实现市民化,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早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第三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必要的基础。

坚持自力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并非与外部世界相隔离,或对立起来。正如以上所述,加入 WTO,融入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寻求达到“三个有利于”的途径与手段,最终目的是谋求我国更快更好地发展。我们的战略与政策是促进对外开放与自力主导的对接、协调与统一,换言之,我们坚持自力主导型战略,不是谋求传统封闭式的自我发展,而是促进开放条件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动发展。但是,正如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和 1997 年最具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告诫的那样,发展中国家不应满足于开放国门,引进外部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及其生成物,而要特别注重吸取发达国家成长过程的方法、经验和教训,少走弯路,发挥后发优势,缩短通往发达社会的时间和路程。这对于我国具有特别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韩德强《反经济全球化思辨》,《国际贸易》2000年第4期。
2. 许祖华《全球化与新殖民主义及跨国公司的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3. 李勃《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后发优势》,《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0年第2期。
4. 董晓钟《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策》,《理论学习与研究》1999年第6期。
5. 张宝珍《经济全球化需要研究的十大问题》,《世界经济》1998年第9期。
6. 美国社论《中国的经济耐心使它免遭亚洲经济危机的冲击》,《巴尔的摩太阳报》1998年10月11日。
7. 日本社论《东亚经济重新起航》,《世界经济评论》月刊1998年1月号。

责任编辑:黄振荣